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现代性 制度外衣下 的传统组织

——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

李柏槐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现代性制度外衣 下的传统组织

——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

李柏槐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邀编辑:张玉洁
责任编辑:徐 燕
责任校对:张振刚
封面设计:吴 强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 / 李柏槐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6.12

ISBN 7-5614-3592-4

I. 现... II. 李... III. 行会制度—研究—中国—
民国 IV. D69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8294 号

书名 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
——民国时期成都工商同业公会研究

著 者	李柏槐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1.5
字 数	36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 001~1 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丛书
SICHUAN DAXUE ZHIXUE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JIJIN CONGSHU

主 任 杨泉明 谢和平

副主任 罗中枢 陈爱民 卿希泰 项 楚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骁	王挺之	王东杰	文富德	石 坚
左卫民	冉光荣	刘亚丁	杜肯堂	何一民
李小北	李天德	李 刚	陈国第	张晓舟
杨天宏	杨 江	赵昌文	敖 凡	徐开来
徐玖平	唐 成	唐 磊	曹顺庆	黄宗贤
黄金辉	隗瀛涛	蒋永穆	潘显一	霍 巍

丛书序

四川大学是中国最早一批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中的一个。近十余年来，又经两次“强强合并”，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综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一百多年来，四川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壮大的过程中，从国学研究起步，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不同的学术流派融合互动，共同成长，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又积极面向世界的学术特征。

作为近代教育机构，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堂算起。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可以直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史中，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史、文章等中国传统之学的重镇。此后，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国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近代“蜀学”成为川大人文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拥有张森楷、龚道耕、林思进、向楚、向宗鲁、庞俊、蒙文通、刘咸炘、李植、李培甫、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的学者。

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新。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俊、刘咸炘等人，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其中，蒙文通由经向史，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包容、开放而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展。1922—1924 年吴玉章在此担任经济学课程，鼓励学生通过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考“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的问题。1924 年，学

校设立了十个系，在人文社会科学六系中，除了更多地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教育、英文、历史、政治、经济五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一科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30 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

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作为教会学校，华大文科自始即以“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为宗旨，而尤擅长于西式学问。其中，边疆研究最放异彩。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及其会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华西大学博物馆以“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各种艺术品，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为目标。在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的主持下，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基地。

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二是提倡跨学科的合作，三是注重实地踏勘，而对边疆文化、底层文化和现实问题更为关注，与国立川大校内更注重“大传统”和经典研习的学术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各有所长，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华大一方面延请了庞俊、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加强了国学研究的力量；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

1935 年，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展。1936 年 5 月，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在文科中首倡实地调研的风气，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此后，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在历史学方面，较之传统史学而言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之扩充的“新史学”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迅速迈向国内史学界的中心。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川大校内名师云集。张颐（哲学）、朱光潜（美学）、萧公权（政治学）、赵人儻（经济学）、徐中舒（历史学）、蒙文通（历史学）、赵少咸（语言学）、冯汉骥（考古学、人类学）、闻宥（民族学、语言学）、任乃强（民族学）、胡鉴民（民族学）、彭迪先

(经济学)、缪钺(历史学)、叶麀(文艺心理学)、杨明照(古典文学)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有的更任教终身,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

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四川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新的学科如宗教学、理论经济学、敦煌学、比较文学、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6年是川大建校110周年,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学校决定设立“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版。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术流派的逐渐形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序

近代中国工商同业公会的研究，既反映了中国行会史、商会史研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的学术趋向，也体现了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换、行业自律规范的现实关怀。自 1990 年以后，开始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已经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领域。因中国“地大物博”，各地区历史演变不同步，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当前的研究中，最需要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城市的个案研究，以充分揭示商人组织的地域性特征，从而为总体性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不过，检视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抗战前上海、苏州等沿海大城市的银行业、丝绸业，尤其缺少内陆城市或区域同业公会的中观研究。成都作为中国内陆的中心城市，历史上素以商业闻名，但关于成都商人组织的研究却十分有限。本书就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历史演变、制度构建、组织功能及其与地方政府、商会的关系进行探讨，恰好提供了一个内陆商业消费性城市同业公会组织的个案研究成果。

近 20 年来中国商人组织的研究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发掘和利用商会的原始档案。本书同样发掘和利用了成都市档案馆所藏的数千卷民国时期成都商会、同业公会、工商联以及地方政府的原始档案，也较多地利用了当时的地方报刊，这些资料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而收集这些浩繁的原始档案和报刊资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经费，克服难以预料的诸多困难；且作为一名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师，作者还有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其他科研任务。在当前社会比较功利和浮躁的大环境之下，没有对学术研究的求实态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本书作为研究民国时期成都同业公会的第一部专著，受益于前人研究的引导和启发。与本书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如研究苏州、上海、天津等地商会、同业公会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四川

地方史的众多论著，对作者的研究都有不少帮助和启发。前辈学者的治学精神和理念、史学思想和方法，也无时不在影响和启发着后学者的研究。学术研究正是在前人的引导和启发下才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本书也体现了作者根据成都商人组织的实际情况所进行的独立思考和认真探索。其一，本书的研究思路虽然受近 20 年来流行的“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较大影响，但与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商人组织“变”的面相比较，作者似乎更关注成都同业公会相对“不变”的面相。其二，本书在注意探讨同业公会的现代性制度的同时，也具体地分析了同业公会的实际运作，从而得出了成都同业公会“实际上就是在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的观点，虽然这一观点还可以进一步论证和深化，但却提示我们对转型社会中这种“貌合神离”、“新旧互渗”的现象给予更多关注。其三，本书虽然没有将成都与上海、苏州等沿海城市的商人组织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但研究中同样存在沿海地区商人组织这一参照系，从对照中发掘内陆地区商人组织的特征。如关于同业公会与商会的关系，提出两者“法律地位上是平等关系，组织管理上是上下级隶属关系”的见解，多少揭示了两者关系的复杂性；关于同业公会与政府关系，提出抗战后商会与同业公会组织成为地方政府统治的“工具”的结论，与以前的“中介”、“中间组织”说亦有所不同。

如果将近代中国商会和同业公会史研究比喻为一座大厦，本书也许只是为这座大厦增添了一砖一瓦，当然，任何学术大厦无一不是依靠坚实的砖瓦建构起来的。对于本书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我相信读者和专家都会有自己的评判。在此，祝愿柏槐博士以本书作为一个新的起点，在学术探索中取得更多成就，并借用最早倡导商会史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的话与之共勉：“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

谢 放

2006 年 6 月 12 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一、选题旨趣	(1)
二、学术史回顾	(3)
三、研究方法与主要内容	(14)
四、关于资料的一点说明	(18)
第一章 清末民初的商帮与商会	(21)
第一节 清末时期的商会与行帮分会	(21)
一、商业发展状况	(21)
二、行帮分会组织	(25)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商帮与商会	(39)
一、工商业发展状况	(39)
二、商帮与商会	(47)
三、商民协会与总商会的冲突	(60)
第二章 同业公会的设立与发展	(72)
第一节 同业公会的设立	(72)
一、成都市商会的成立	(72)
二、同业公会的设立	(79)
第二节 同业公会的发展	(85)
一、社会背景	(85)
二、工业发展概况	(91)
三、商业发展概况	(99)
四、工商同业公会的发展概况	(109)
第三章 组织管理与行业管理	(137)
第一节 机构设置	(137)
一、委员会制时期 (1929 年—1942 年)	(137)

二、理事制时期(1942年—1949年)	(143)
第二节 组织运营	(146)
一、会员的入会与出会	(146)
二、领导职员的民主选举及任期制度	(153)
三、会议制度与集体决策制度	(162)
四、经费管理制度	(166)
第三节 行业管理	(172)
一、同业经营资格的限制	(173)
二、同业业务经营的管理	(177)
三、同业交易市场的管理	(184)
四、同业牙行的管理	(192)
五、学徒管理及职业教育	(195)
六、各种公益互助团体的管理	(201)
七、同业工商纠纷的协调	(204)
第四章 同业公会与地方政府之关系	(210)
第一节 各业公会的抗捐斗争	(210)
一、各业公会的抗捐斗争	(210)
二、抗捐斗争的历史背景	(231)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同业公会的控制	(239)
一、商会组织的整顿	(239)
二、组织方面的控制	(244)
三、经营业务的管制	(251)
四、精神方面的控制	(260)
第五章 同业公会与商会之关系	(268)
第一节 两者之间的矛盾关系	(269)
一、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关系	(269)
二、上下级的团体组织隶属关系	(280)
第二节 围绕商会改选的冲突	(299)
一、第一次改选冲突	(299)
二、第二次改选冲突	(313)
结束语：现代性制度外衣下的传统组织	(327)
参考文献	(341)
后记	(355)

绪 论

一、选题旨趣

工商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由同一区域内之工商同业者设立的,以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

中国工商同业组织有悠久的历史,“盖当太古经济问题发生以后,由自然经济时代而进为货物交易时代,乃所谓同业公会者,遂应运而生焉”^①。这里所称的同业公会,含义为“公众之会”。民国以前的工商同业组织,唐宋时期称为“团”、“行”,明清一般称为行会、会馆、公所或帮。1918年,北京政府农商部颁布《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吾国工商业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其称为工商同业公会者,则始于民国七年颁布之工商业同业公会规则”^②。1918年以后,各地相继出现同业公会组织,如天津,截至1920年设立公会组织达到40个。^③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在要求各区域工商同业者设立公会的同时,又规定“原有关于工商业之团体,不论用公所、行会或会馆等名称,均得照旧办理”^④。于是,有的地方出现了既有同业公会,又有公所或会馆等组织,如上海工商团体中,到1926年,仍然有会馆、公所组织239个,但也出现了大量同业公会组织;^⑤有的区

① 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中华书局,1995年,第115页。

② 工商部工商访问局编:《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诠释》,1930年印行,第67页。

③ 天津档案馆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48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农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45页。

⑤ 魏文享:《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6月,第39页。

域根本就没有组建同业公会，仍然保留了原有行业“帮”的构架，成都即是如此，实际上就是一个新旧杂处的格局。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要求“凡在同一区域内经营各种正当之工业或商业者均得依法设立同业公会”，而且要求原有公所、行会、会馆或其他名称工商团体组织，均应在一年内依法改组设立同业公会。^①这之后，公所、行会、会馆或帮等名称的工商同业组织在中国消失，工商同业公会组织在全国陆续建立起来，成为民国时期工商同业组织的主要形式。据统计，截至1933年6月底，全国21个省市向国民政府实业部备案的工商同业公会共计4185个。^②

民国时期的工商同业公会，虽是工商业者根据法规组建而成的社会团体，但在民国政制中也扮演着重要的制度角色。在民国政府一方而言，同业公会等商业组织是政府“推行政令、控制社会的工具”，是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1939年，成都市市长杨全宇在各同业公会文书会计训练班开学典礼训词中就明确阐述道：“现在政府方面对于都市居民已有保甲组织，但是单有保甲组织还感觉不够，要是各同业公会能组织健全，其所收的效果，必定比现在的保甲组织还要来得强些。”他说，一个都市的构成，系以工商业界为主要分子，都市里面的各种问题往往与工商业会发生密切的关系，工商业之荣枯往往直接影响到都市之盛衰，而且也关系国力之强弱。他认为工商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相依相助”，必须要“上下合一，必须声息相通，意见一致，民情易达于政府，然后政令乃易推行于民间”。各同业公会“既是都市政府的基本组织，在消极方面负有臻进同业福利的任务，同时在积极方面负有协助政府推行政令的任务”。^③曾长期在南京国民政府从事同业公会管理工作的李森堡也认为，同业公会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同业公会是社会最基层组织，亦如同保甲为政治之基层组织一样为工作起点”，政府借助同业公会等团体组织，“也便于管制，容易动员”，“如保甲组织在政治上负起了宪政实施和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史料汇编》第5辑第1编财政经济（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90~691页。

② 黄逸峰等著：《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2页。

③ 杨全宇：《文书会计训练班开学典礼训词》，《成都市政府周报》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期（合刊），民国28年（1939年）7月1日。

配合地方自治的艰巨责任,但是同业公会在社会经济上也可以说同样地负起了实施宪政和配合地方自治的艰巨责任,保甲组织是决定于地缘性和政治性,同业公会却决定于业缘性与社会性”。^①可见,同业公会如同保甲组织一样,是民国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基层组织”。所以,对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制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厘清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从一个层面加深对民国社会的认识。同时,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种行业协会、行业公会在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对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构建起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行业管理制度。^②正如马敏所言,如果能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将当代行业协会、同业公会等组织与近代同业公会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正确规范当今行业组织的发展与作用更不乏其现实意义”^③。

二、学术史回顾

1. 行会史与商会史研究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研究,缘起于中国行会史研究和近代商会史研究。

根据朱英对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学术回顾,中国行会史研究最早可

① 李森堡:《同业公会研究》,青年书店,1947年印行,第11、165、169页。

② 关于当代行业协会研究,近期的主要成果有:陈清泰主编:《商会发展与制度规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戎文左主编:《从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编:《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讨》,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年;张崇和:《行业发展与协会工作的思考》,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年;刘建民编:《商业行规及其疑点、热点、重点、难点》,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9年;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编:《全国工商领域行业协会职能与作用》,中国商业出版社,2000年;蒲文昌等:《市场经济与民间商会——培育与发展民间商会的比较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宋美瑛:《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行业管理问题》,《经济研究》1995年第8期;李宇龙、吴健中:《构建新型的监管体系:关于组建我国商业银行同业公会的思考》,《上海金融》1997年第8期;李修义:《同业公会是实行行业管理的一种好形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第5期;吴刚:《“入世”与行业协会创新》,《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余晖:《行业协会及其在中国转型期的发展》,载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年1月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等等。

③ 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开始以田野调查方式对中国行会进行考察,但缺乏较为深入的研究。进入 20 世纪以后,一部分中外学者对行会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颇具价值的研究成果,如郑鸿笙的《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国闻周报》第 2 卷第 19 期,1925 年)、全汉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 年)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中国史学界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行会也是其中重要的议题,不仅研究成果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学术水平也明显提高,如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期中国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历史研究》1965 年第 1 期)、何柄棣的《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 年),等等,而且这一时期还整理出版了大量行会碑刻、史料等资料辑刊。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史学界开始关注和研究近代商会史,行会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宽,并且将行会与近代商会、近代同业公会进行比较研究,认识进一步深化,有价值的成果辈出,如魏天安的《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 年)、王翔的《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等;资料的整理也有了新的进展,出版了《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5 年)、《苏州丝绸档案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年)、《清代工商行业碑文集粹》(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北京会馆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 年)等。史学界对中国行会史的研究,主要探讨了行会的产生时间、行会的特点、行会的功能、行会的作用、会馆公所的性质、行会的发展演变、行会与商会的关系、行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并进行了中外行会的比较研究。^①中国传统行会是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的前身,民国时期的同业公会是中国传统行会的延续,因此,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成果,为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研究,一方面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可资比较研究的素材,而且随着中国行会史研究的深入,也呼唤对其民国时期的延续形态——同业公会进行梳理、比较、总结。

中国近代商会史的研究,1980 年以前有海外学者开始关注,内地学者无专门讨论。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经章开沅的提

^① 关于中国行会史研究的详细情况,参见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 年第 2 期。

倡,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起步,商会史研究逐渐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目前成果已极为宏富。^①这些成果中,除了《天津商会档案汇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等大型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外,颇有份量的代表性著述有: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朱英著《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马敏、朱英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马敏著《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朱英著《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马敏著《商人精神的嬗变——近代中国商人观念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英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宋美云著《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已有的研究,从资产阶级、传统与现代、市民社会、社团主义、中介网络等多个理论视角,^②对商会的成立与发展、商会的性质、商会的特点、商会的成员构成及领导权、商会与政府间的关系、商会与会馆公所的关系、商会与传统行会组织的关系、商会的政治参与等等问题,进行了多元化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史、社会史、现代化史和经济史诸研究领域的进展”^③。但这些研究,理论尚有缺失,研究方法仍需改进,商会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民间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主题研究有待深入。除

① 关于中国商会史研究的详细情形,参见朱英:《清末商会研究述评》,《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徐鼎新:《中国商会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赵洪宝:《近几年来大陆学者关于中国商会史的研究》,《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台北)16期;虞和平:《近八年来之商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朱英:《与时俱进的商会史研究——兼评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② 参见魏文享:《民国时期工商同业公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6月,第8~11页。

③ 马敏:《近十年来中国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近代史学刊》2001年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